

汇率形成机制更市场化 人民币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汇改十年带来多少真金白银

本报记者 陈果静

热点聚焦

汇改10年,无论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还是汇率形成机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市场、对企业、对人民币国际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改革依然在路上——



从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汇改已走过了10年的路程。10年间,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5%,到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从汇率形成机制越来越市场化,到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向前推进……

一路走来,汇改的成果有目共睹。展望未来,汇改的进一步深化仍需更多努力。

从单边上涨到双向波动

至今,不少企业仍然在逐步适应人民币双向波动带来的变化。从去年全年的数据看,我国企业尚未充分利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2014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上升,但企业从事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不增反降。

这与此前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单边升值有关。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单边升值走势。虽然在2011年,受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人民币汇率一度呈现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但2012年至2014年初,人民币汇率又重回升值通道,最高交易价一度升至6.04元兑1美元。

这种单边升值的状况在2014年有了改变。2014年3月,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日间波幅进一步扩大至2%。此后,人民币汇率开始改变过去单边上涨的走势,呈现双向波动,汇率弹性进一步增

强。这与汇改初期水平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一步走得有序、稳健。2005年7月21日,汇改之初,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间有管理的波幅为中间价的上下0.3%;2007年扩大到上下0.5%,2012年进一步扩大至上下1%,随后,2014年3月扩大至上下2%。

双向波动不只是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种变化,更体现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正在逐步完善。对汇率的其他各种管制也在逐步放开,如2005年取消了对银行为客户办理结售汇业务时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挂牌汇率浮动区间的限制;2014年7月起,取消了美元兑人民币的挂牌汇率浮动区间限制,零售市场取消了汇率浮动区间管理。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

伴随着汇改的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较2012年初排名提高14位;市场占有率达2.18%,是2012年初的8.7倍;同时,人民币稳居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也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已从2009年底的0.02%提高到2014年底的2.47%,5年间增长了120余倍。《报告》认为,到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初期目标已基本实现,并有望在两年内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

人民币“走出去”是市场的选择,也是我国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重要一步。尤其是在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

从下面这组数据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初期,我国货物贸易结算量仅32亿元,而到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已达3万亿元,体量已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币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储备货币。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的央行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范畴。与此同时,截至2015年5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并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

“过去6年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进展。”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速对全球投资者吸引力较大,为降低汇率风险与交易成本、实现全球资产布局的多元化,全球投资者更趋向于配置人民币资产。而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也拓宽了境外投资者投资的渠道与空间。

汇改仍须继续加力

展望下一个10年,在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下一步汇改的重点

又有哪些?

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是当前各方呼声较高的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仍处于较低水平,下一步汇改必须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必须战胜“有压力时不敢动,没压力时又不想动的‘浮动恐惧’”,抓住当前外汇供求基本平衡、汇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相关改革。

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是汇改的“重头戏”。不少专家呼吁,应大力发展、完善以直接融资为代表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与此同时,稳健、有序地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

在跨境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央行在《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指出,今年将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按计划于年底完成一期建设。此外,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进一步拓宽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和范围。同时,将继续稳步开展双边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央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阶段,央行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成都农村金改试点方案印发

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本报北京7月22日讯 记者张忱 刘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银监会等部门制定并印发《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据悉,《改革试点方案》出台过程中,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充分研究,制定了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健全配套政策措施5个方面的19项金融改革任务。央行称,力争到2020年,建立较为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取得重大突破,率先形成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基本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央行表示,成都市是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以来,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总体方案,在建立农村产权制度、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探索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改革发展等方面积极探索,成效较为显著。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正处于关键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也处于深化期。在成都实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对探索符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求的金融改革创新,强化农村金融在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中的积极作用将起到重要的示范带动效应。

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数据发布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同期最高

本报北京7月22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数据显示,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6月末,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比上季末低1.5个百分点,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5.2个和3.3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1个百分点。

企业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增速上升。6月末,短期贷款增速上升,中长期贷款增速有所下降。6月末本外币企业及其他部门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余额30.66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上季末高0.9个百分点;而本外币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余额34.41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季末低0.9个百分点。

住户消费性贷款增速回升。6月末,本外币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16.98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增速比上季末高1.1个百分点,1—6月份增加1.6万亿元,同比多增3897亿元;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8.14万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上季末低2.5个百分点,1—6月份增加3509亿元,同比少增3143亿元。

房地产贷款平稳较快增长。6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19.3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与上季末基本持平。

风向标

“偿二代”首份季度报告发布

保险业一季度偿付能力整体充足

本报记者 姚进

日前,中国保监会完成了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简称“偿二代”)试运行首份季度报告的分析工作,即2015年1季度报告。数据显示,偿二代下,一季度末保险业行业偿付能力整体充足。全行业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64%。

与偿一代相比,偿二代的风险识别能力显著增强,各家保险公司由于风险状况不同,偿付能力充足率有升有降。业务结构好、投资稳健的公司风险较低,偿付能力充足率较偿一代下提高,而风险高的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较偿一代下降低。总体看,大约三分之一的公司充足率较偿一代下提高,三分之二的公司较偿一代下降低。

偿二代下,一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公司共有13家。“不达标公司数量比偿一代下增加,说明偿二代能够更加全面、科学地计量风险,一些本身风险较高、但在偿一代下达标公司,在偿二代下暴露了真实的风险状况。”保监会相关人士称。

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的保险公司该如何应对?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保险学系主任王绪瑾认为,首先需要补充资本金,控制成本,同时提高投资盈利能力和。

“当然,解决问题最快的方式依然是补充资本金。偿二代将资本金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分为一级、二级,附属资本同样分为一级、二级,并对不同资本类型占比进行规定,意味着给了险企更多的选择。”一位市场人士认为,这有助于中小型险企缓解资本压力。

事实上,保监会在强化资本约束的同时,还在不断完善行业资本补充机制,拓宽行业资本补充渠道。比如,研究起草了《保险公司资本补充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普通股、优先股、资本公积、留存收益、债务性资本工具、应急资本等八大类资本补充渠道,打开了保险公司资本工具的创新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与偿二代测试时2014年6月末的数据相比,2015年一季度末行业偿二代偿付能力状况明显改善,财险公司上升40个百分点,寿险公司上升37个百分点,再保险公司上升77个百分点,不达标公司数量大幅减少6家。“这反映出偿二代规则已经引导公司着手调整经营战略、加强风险管理、改善偿付能力状况,偿二代实施的成效正在逐步显现。”保监会相关人士表示。

本版编辑 孟飞

电子邮箱 jrbjr@126.com

(上接第四版)1975年底,在“四人帮”肆虐之下,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万里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持续9个月的铁路系统整顿工作也随之中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万里同志再次恢复工作,1977年2月,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同年6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体察民情,仅用三四个个月时间,就掌握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面对十年内乱造成的严峻局势,他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较快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重大问题。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疾苦,以犬无畏的勇气,打破“左”的禁锢,提出农村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勇敢探索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转变农村面貌的新路子。他主持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突出强调农村工作的中心是农业生产,必须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万里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他领导安徽农村改革的功绩,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全省人民的普遍赞誉。当时在安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4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工作;8月,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1年3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82年2月,兼任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7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同年8月,兼任国家人防委

主任;9月,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10月,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组长。

万里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在分管农村工作期间,他注重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多次组织农村广大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了解农村情况,倾听农民意见。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科学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他提出要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生产,肯定“包干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运用。1982年至1986年,他领导起草了5个中央1号文件,经中央研究批准后下发,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他还提议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制度长期不变写进宪法。万里同志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普及教育等途径,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除农村工作外,万里同志还参与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动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各方面改革。他认真总结运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把转变机制、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注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他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主张,提出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他积极探索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支持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我们国家的一件根本大事。他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书记。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方面,主张通过改革进一步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强调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加快经济立法,保障改革和建设的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他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8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产品质量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工会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对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组织起草并提请审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国家对香港、澳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对31件法律和6个决定的执行情况组织开展了53次执法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提出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督部门、司法部门工作,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他高度重视人大自身建设,强调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继续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完善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制度以及人大议事程序,制定了代表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等重要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人大工作规范化程序化。他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992年10月,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

万里同志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经过认真调查和慎重研究,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3月,万里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严格自律,对改进党的作风、惩治腐败坚定支持,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万里同志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万里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万里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善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工作作风踏实。他襟怀坦白,清正廉洁,团结同志,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万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万里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